目　录

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章执中（1）
我研制煤气车和从事煤气车事业的回顾……向　德（35）
我所创办的三家民营工厂……彭庆阶（48）
正圆动力配件厂的创立和发展……戴子骐（57）
浏阳编炮、烟花的生产与销售……王般生（65）
邵阳的土纸业……陈新宪　肖学悦　陈伯斋（74）
益阳铸锅业的历史……罗士奇（83）
长沙的竹艺雕刻……袁　涤（90）
一度闻名中外的菲菲伞……欧阳佩华（96）

左学谦的生平事略……黄曾甫　黄曦龄（101）
解放前的长沙米粮业
……彭绪坤　屈先俊　李芸青　熊伯鹏（117）
近百年来长沙绸布业的变迁……梁泽润　梁文聪（144）
从鸿兴钱庄到鸿兴银行……张国岱（159）
长沙照相业史话……朱振三（162）
我所经营的雷同茂瓦货店……雷韵伯（171）
湘潭药材行的经营情况……张秀文（179）
衡阳著名中药店敬一堂……杨达三（18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衡阳宝华书局和新文化书社
…… 衡阳市民建、工商联史料工作组(190)
德茂隆的香干子…… 彭芝亮(193)
徐长兴的吊炉烤鸭…… 徐家麟(195)

长沙市商民协会的回忆…… 陈伯勋(198)
大革命时期的衡阳商民协会
…… 肖伯麟遗稿(205)
津市旧商会概况…… 津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10)
三十年来改造历程的回顾…… 杨灏湘(217)

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

章执中

为发展民族工商业而奋斗一生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名锐，以字行，一八八三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病逝于重庆市沙坪坝南渝中学南园寓所。现将我所知道他的一些事迹记述如下。

一、出身与求学

范旭东幼年失怙，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城内定居。范母既无祖遗之业，又无亲朋相助，在贫困处境中，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那个"慈善事业"机关的供养度日。范源濂长范旭东约十岁，他与蔡锷同时就学于清末维新派人物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从而结识了湖南的开明人士龙璋、杭生、许玉屏等人。在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下，范源濂、蔡锷等青年胸怀救国大志，在时务学堂勤奋学习，名列前茅，深受梁启超爱护，范源濂更得以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以资赡养老母和培育幼弟读书。

范旭东在兄长提携下，读了几年私塾，于一九〇〇年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进入工专和大学学习，一九一〇年，以优良学业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据他自己说：当时，他潜心学习，常与日本同学同住、同食、同学习、同搞体育活动。这虽然

使他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接触减少了，却没有因生活异域而在思想上被奴化。恰恰相反，通过与日本人的深入接触，对日本民族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领会，更加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和勤奋学习的精神。他看到日本发展快，以小凌大，先后战胜中国和帝俄后，更加痛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他常常说："中国是弱大，日本是小鬼。"他向往祖国富强，常以艰苦卓绝，勤劳勇敢的作风要求自己，并身体力行。

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大毕业后，被学校留下来担任专科助教。这时，他与我的姨母许馥结了婚。许馥是一九〇五年由我外祖母带领去日本以官费留学，在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学习的。

二、归国任职和赴欧考察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范旭东偕妻归国，在北京与母亲和兄长范源濂等团聚。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把当时流通市面的铸有"龙洋"图案的银元改铸为袁世凯半身像的银元。范旭东被派到铸币厂负责银元的化验分析。这是他初次也是毕生唯一的一次担任官职。当时规定每枚银币的重量为七钱二分，纯银含量为百分之九十六，可是铸币厂偷工减料，从中贪污，擅自降低纯银含量。范氏刚出校门，满怀报国热情，每日辛勤化验，发现没有一次取样符合规定标准，他向上面反映，要求回炉重铸，未获支持，一怒之下，只干了两个月就坚决辞职了。后来每提到这件事，他就说："我一次就饱尝了官场腐朽的滋味。这样也好，使我另辟途径，自谋出路。"

范氏离职不久，范源濂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随即为他找到一个到英、法诸国考察实习的机会。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前夕，英、法、德等国工商业已大发展。他以考察盐务为主，兼及制碱化学工业。当时国外制碱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路布兰法，即以芒硝（硫酸钠）为原料制碱，一为苏维尔法，系以食盐（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制碱。后者成品纯度高，为用户所乐用，畅销全世界，因而在技术上形成专利垄断，对外不予公开。范氏在英、法、比等国考察用苏维尔法制碱的工厂，多次碰壁，不让进入现场，仅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参观了锅炉房。这一遭遇，对范氏是一莫大的刺激，使他原来在日本求学时代所树立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创业思想，变得更为坚定了。

三、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碱厂

范旭东一九一四年从欧洲考察回国，向有关当局汇报后，即着手筹办久大精盐公司。当时，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朝末年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把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关税和盐税，都充作了战败赔款。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监督税收，偿还债款，规定设在各通商口岸和各省省会所在地的海关监督和盐务稽核处的总稽核职务，均由外国人充当，以控制关、盐两税，按期收缴并存入外国银行（其中英国汇丰银行经办最久，存款最多）。列强还在上海、天津、汉口、九江等通商口岸开辟租界，形成“国中之国”，利用租界化外之区，搞非法走私牟利。食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洋商则以供应外国官民食盐为借口，不仅向租界内的中外居民免税销售，而且将未完税的盐运销到外人住居的各通商口岸，占据我国原有的食盐市场。我国长江中下游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南部等地，自清朝曾国藩创行“引岸”制以来，食盐运销实际上是由官商合伙垄断。民国成立后，仍然保存此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弊政。盐商挟其资财，勾结掌权官僚，左右盐政，鱼肉人民。为了抵制走私，挽回权益，对抗弊政，活跃经济，范氏决心先从盐业开始实行革新，自制精盐，远销天津、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宜昌等通商口岸及其他各地。他与担任过盐务署长的景本伯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盐公司的申请。消息传开，即遭到旧盐商的反对。但社会舆论极力支持，当局不得不予批准。

由于九一三年，久大精盐公司（一九一九年以后改为久大盐业公司）开始招股集资筹备。随即在天津塘沽建厂，以海滩晒盐或卤水加工，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制成精盐。

久大创办之初，集资仅五万银元。十年后，股本扩大到二百五十万银元。公司由景本伯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景氏在创办时有五万元股本，范本人及其在亲友中募集的股本大致与景氏相等。但增资扩充后，湘籍股本激增，其中如蔡锷将军即占十万元。此外，如黎元洪等，亦占有一定股份。

久大精盐问世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业务发展极快。各地经销分店只做批发，不做零售，随运随销，获利可观。大约开业后两年中，股东除领取股息外，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至三成的红利。范氏因此赢得股东的信任，成为民族工商业界崭露头角的人物，这就为他以后创办永利碱厂提供了条件。但与此同时，旧盐商在其政治代表人物支持下，集合他们的朝野势力，累月经年与久大纠缠诉讼，初则企图连根拔掉久大，以便他们卷土重来，垄断盐业；继则挟其雄厚经济实力，与久大争夺市场。旧盐商经营远销的同业联合组织为"淮商公所"。范氏便与经营精盐的同业组成"精盐公会"与之对抗。景本伯出任第一届"精盐公会"会长。但景氏在久大经营获利后，思想保守，专为个人发财致富，范氏

则兼顾发展实业、挽回权利，趁久大业务兴隆、积累资本的黄金时代，建面议由创办永利碱厂之议。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一时无暇顾及远东，日本帝国主义者便乘虚而入，除对中国继续进行军事侵略外，还在上海、青岛等地租界内，陆续兴建纱厂和输入各种工业品，填补英、法、德等国遗留下来的市场。我国所需化工原料纯碱，历来为英商卜内门公司所垄断，在大战中，远洋运输困难，日本的化学工业又处于初建阶段，无力外销，而我国纺织品的印染加工和锑矿的冶炼，在在需要纯碱，供需矛盾非常尖锐。根据这个情况，范氏便向久大公司董事会提议筹设永利碱厂。景本伯迫于群议，只得附和赞成。

永利碱厂，设在塘沽久大盐厂旁。创办于一九一七年。开始建厂以前，范旭东本人曾在天津寓所井院内，根据苏维尔制碱工艺流程，设计、装置一套制碱试验设备。经过日以继夜的奋战，终于试验成功，取得九公斤的纯碱产品。这对范氏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曾将这个小试验场的照片，分送其亲友作为纪念。范氏为了早日向市场提供纯碱产品和扩大原料来源，曾派出以李烛尘为首的考察团到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省区天然碱产地进行考察，企图与地方合作，共同开采露天矿田，运到天津提炼纯碱。考察团带回了天然碱样品和现场拍摄的照片多帧，以及开发建设方案。但终因当时军阀割据，交通不便，要用骆驼载运，长途跋涉，困难太多而作罢论。当永利碱厂开始筹建，向政府申请注册立案时，定股本总额为一百万元，其中半数由久大以法人身份认股，另半数公开招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与范氏为留日同学。久大创业，筹集资金，申请批准立案等事，多赖周氏从中筹划协助。永利初次集资四十万银元及以后增资招股，周氏均全力相助，除直接投资外，并出面动员别人认股。从而使金城银行与久大、永利

两公司在财务上结成密切关系，以周作民为代表的“小四行”对久大、永利在金融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永利碱厂是范氏在国外考察技术没有取得收获，负气进行科学试验，摸索工艺流程，自己设计图纸，再向美国订购设备，而安装建设起来的。由于在设计大厂之前未向国外引进技术，甚至连某些关键性部件的技术资料也不愿花钱购买，完全凭自己的热情与有限的科学知识，进行设计，以致设备和安装一改再改，长期不能正常运转。加上未做中间工业性试验，取得建设大厂设计所必要的数据与参考资料，也影响了生产。后来，他吸取了教训，在举办南京合成氨厂与支持侯德榜研究“联碱法”时，改了过来。

范氏最初派赴美国采购碱厂设备的是苏州陈调甫。侯德榜是经陈调甫在美结识后邀约回国与范氏相见而进入永利碱厂的。永利在美国购置设备，系委托李国钦① 独资经营的纽约华昌贸易公司经办的。

永利碱厂与久大盐厂相毗邻。据范氏后来回忆说：“当我初到塘沽勘选久大厂址时，看到一望无涯的长芦盐滩，洁白的盐粒在

①李国钦（一八八七——一九六一），学名李炳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高等工业学堂矿科，后进入华昌炼矿公司，任业务部副经理（作者之父章克恭任该部经理）。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公司派驻美国纽约坐庄。他利用当时锑价暴涨暴跌的机会，大发其财，在纽约自创华昌贸易公司，继续经营我国出口的钨、锑、锡等矿产品及桐油，还为国内工矿及兵工企业采购各种设备和器材。李氏于一九一六年加入了美国国籍，曾担任纽约市五金同业工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委以战时物资局顾问，战后获得美国政府的勋章。李氏在美国和巴西等国的许多企业中都有投资。他逝世后，其后人遵其遗愿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李氏基金，以奖励对冶金学术有创新的人才。其华昌公司已转让他人，仅保留炼钨矿公司，在纽约长岛继续经营。范旭东与李国钦相识系作者之父章克恭介绍的，二人友谊甚笃。范氏所办的天津永利碱厂及南京、四川、湖南各厂的设备，大都是委托李氏在美国的华昌公司承办采购的。

阳光下闪闪发光，又见到石灰石岩遍地皆是，感到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实为创设碱厂的适当地点。"

当时，我国化学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要自力更生地掌握制碱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范氏与国际制碱专利者谈判购买制碱技术时，对方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如要求在合同上规定，生产关键工序由他们派人直接操作，不带学徒，不传授技术，产品出售，按产量收取专利权费额，在我国内销售产品，要由他们规定市场，不许在其他地区销售，等等。对这些条件，范氏断然拒绝，由此更激励了他自力更生的决心。在范氏及其技术骨干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余年的摸索，终于获得成功。范氏本人虽因身兼永利、久大两公司经理，对内对外事务丛集一身，但他每到塘沽工地都经常检查施工情况，研究处理工程中的各种问题。事后他回忆这段奋斗的历程，说，由于我们未掌握碱性对钢材的腐蚀作用，采用钢管作传送碱液的管道，因钢管不耐碱液腐蚀，经常损坏，随补随漏，影响设备运转，以致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后来，他下决心将价值十余万元的钢管全部折除，改用耐腐蚀的生铁铸管。为了吸取这一教训，他将拆卸下来的几条钢管，请工人做成一只桌子，置于自己的办公室中，以警惕因自己无知所造成的损失。

在永利碱厂未能突破技术关的时候，通过李国钦的罗致，在美国招聘了一位正在赋闲的美籍制碱工程师。这个美国人对范、侯两人共心创业的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再次应聘来永利碱厂工作。他经过平衡工艺计算，主张扩建厂中的石灰窑，把日产量从五十吨提高到一百五十吨，同时增加一套日产三十吨的烘碱车间，使碱厂生产日益系统化。为了表彰这位美国人的贡献，范氏等人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姓名，叫李佐华。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永利碱厂不仅生产了碱（最高日产二百吨），而且培养了一批制碱技术骨干，如许藤八、张佐汤、郭锡彤、李祉川、谢为杰、章怀西、鲁波、刘嘉树等。在公司总管理处，范氏依靠了许绍周、肖豹文、胡耕虞、余啸彩等人主持永利内务。后来，范氏总结创办碱厂的经验，认为用苏维尔法制碱工业的规模，不宜过小。永利碱厂原订规模只日产一百五十吨，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不符合客观要求，既影响生产的发展，又因产品成本高，难于适应市场竞争。

在未突破制碱技术以前，范氏为了挣持这个企业，曾在不断增加基建投资方面煞费苦心。所需资金，首先是运用久大盐业公司每年的盈利积累来调剂挹注，但远远不敷需要，还须设法贷款。由于永利碱厂长期不能生产自给，信用未著，难以用永利名义对外借贷，只好用久大名义向银行借钱。其中支持范氏最力的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该行对久大用款，几乎有求必应。在十余年中，永利通过久大向银行透支的金额达数十万元，超过久大和永利两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半数。这种信贷，在当时金融市场上是少见的。身居久大董事长的景本伯对此局面极为不满，在久大董事会上向范氏提出质问，形成景、范对立局面。当时持有久大和永利股票的金城银行，以及受其支配的股东大户都支持范氏，景本伯只得辞去久大董事长。股东大会决议，将两公司的董事会改为总经理制，并推举范氏担任两公司总经理。从此事权集中，便于调度，使永利在日后得到较大的发展。范氏在未摆脱经济上的困窘以前，除严峻拒绝英国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提出收买碱厂的阴谋（详后）外，还于一九二七年夏亲自到南洋菲律宾等地，向爱国华侨宣传，争取华侨向永利投资，以充实公司财力。他此行收获甚大，华侨答应的投资达百万元。但当他得知永利碱厂的生产有所好转，产量初步稳定，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时，便没

[illegible]系，[illegible]资金了。

[illegible]关，生产逐步正常，有产品供应市场以后，范旭东又努力为产品纯碱打开销路，突破向来为“洋碱”所垄断的我国市场。他原想用分布各地的久大营业机构兼销食盐和纯碱，但因销售对象不同，业务各有特点，难以适应，不得不改变办法。除在上海市租界内设立久大、永利联合营业机构外，又在南京、汉口、长沙等地单独设立永利营业机构，以供应长江流域的肥皂、玻璃、搪瓷等工业的用碱。湖南锑矿很多，冶炼锑氧、纯锑耗碱量大，为了使永利的三角牌纯碱夺取卜内门的“洋碱”在湖南的市场，永利在营业上采取赊销的办法，获得用户的欢迎。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范氏早在一九三〇年间利用日本财阀三井与三菱之间的矛盾，委托三井贸易商务株式会社作为在日本销售永利纯碱的总代理，打入日本市场，推销了部分产品，同时派得力人员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设立业务机构，让前者作为永利纯碱进入国际市场的窗口，后者作为该厂在华南地区推销产品的一个基地。在我国，“纯碱”这个新名词，就是范氏首先用以代替“洋碱”这个旧名词的。为了宣传国产纯碱的优越性和三角牌纯碱的高成分，他在天津、上海等地的报纸上大登广告，在包装纯碱的麻袋上印上“永利纯碱”的标志。所用商标的设计，是在一个烧杯（即做化学实验的烧杯）图案内加上一个红色三角形。这个图案象征纯碱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同时有气体、液体和固体三相的直接反映。它是苏维尔法制碱工艺技术的特征。范氏主持下的永利碱厂获得成功，使他在我国民族工商界中的声望大增，在知识界也博得广泛的赞誉。这为他后来筹建永利南京合成氨厂（简称宁厂）创造了条件。

四、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氏于从事实业之馀，还坚持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场，积极提倡科学救国，支持科学研究。他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劳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这是他毕生创办的三大事业之一。黄海社正式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其前身为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开始，利用精制食盐的卤水，提取大苏打（即硫化硫酸钠），并生产过咸味刷牙水和漱口水应市；后来又利用永利碱厂的副产品，生产炭酸钙、炭酸镁。它出产的明星牌牙膏（也带有盐分），在抗战前后一个时期内，独步市场，风行一时。但范氏创设黄海化工研究社的宗旨和目的，不仅是为本厂的生产服务，解决制碱中的一些科研问题，而且在于培养造就一批化工科技人才，为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服务。为此，范氏将孙颖川博士（字学悟，山东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学化学）从开滦煤矿化验室延聘前来，担任黄海社社长，主持其事；并陆续罗致国内专攻化学、化工的大学毕业生和留学生四十多人到该社工作，以充实科研力量；还大量收集国内外科技资料，添置科研仪器，以备应用。社内除分设化工原理、应用化学等部门外，还单独成立了发酵化学部，延请曾在法国斯巴德研究所实习过的方心芳氏主持。后来又设立海洋化学研究室，作为该社远景研究规划的一个部分。该社不仅为久大、永利两厂培养和输送了一批科技人才，还选拔了一些人到日本和美国实习深造。抗日战争期间，该社由天津塘沽海滩迁到四川五通桥盐区后，曾指导协助当地盐户采用露天枝条架蒸发井盐水份，提高卤水含盐浓度；并改革了熬盐炉灶，节约了燃料，降低了成本，深受盐户欢迎，在川西五通桥、竹根滩

方圆数十里地区，获得推广。这种利用自然温差的蒸发技术，实际就是利用太阳能的一种简便形式，是节约能源的一种有效办法。黄海社在川西期间，还曾派范维工程师到附近的嘉定碱厂长期协助工作。范维指导该厂用路布兰制碱法，将纯碱的含量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的纯度，与用苏维尔制碱法制出的产品相埒。解放后，该厂仍在生产并获得发展。再如全华酱油公司和鲜果汁厂，从发酵、酿制、防腐等技术的研究到施工建成投产，也得到黄海社的全面指导与协助。当时，该社共发表了卅九篇研究报告。抗战胜利后，黄海社迁回塘沽。解放后又迁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黄海社即申请并入中国科学院。该社的科研人员连同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北京的社址房屋，全部无偿地献给了国家。社长孙颖川出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孙于1952年病逝。

五、开办青岛永裕盐业公司、汉口信孚盐业运销公司、连云港久大大浦制盐分厂

在永利碱厂艰难创业的过程中，范氏为了摆脱公司在经济上受到的压力，仍寄希望于发展盐业，积累资金。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年，先后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以生产和运销青岛的海盐为业务。永裕公司是范氏通过外交途径，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我国主权的一个企业。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德国无力东顾的时候，乘机入侵我国山东省，强迫利诱妄图称帝的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继承了德国侵略者在青岛租界、烟台地区以及胶济铁路的种种特权。其中有一个产盐的大海滩，也为日本所接管。因日本是个岛国，海疆沿岸鲜有滩头，不能利用海滩晒盐，其民食和工业用盐长期依赖我国

供应，而青岛又是供输该国用盐的一大基地，所以它要攫取这个海滩。在全国人民强烈抗议之下，袁世凯当时不敢公开承认卖国条约"二十一条"。袁死后，北洋军阀北京政府为了欺骗舆论、稳住民心，曾派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收回山东省的主权。日本政府在保留其某些特权的条件下，允许交还青岛租界和胶济铁路的管辖权。对于它所侵占并经营了一段时间的盐滩和设施，则要求我方给予补偿，并要求在我方收回盐滩后，继续免课盐税，只偿付工本费，每年运销日本食盐一百万担。范旭东曾赴青岛参与谈判。几经交涉，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终于迫使日方让步，只由范氏等筹集补偿费二十万元，并向日本输出一定数额的免税工业用盐，便收回了盐滩及其设施由范氏经营。范氏经营青岛盐滩后，成立了永裕盐业公司，由刘弗三、任致远主持该公司的业务。

汉口信孚盐业运销公司是为销售青岛永裕公司的盐产而设立的。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国民政府也由南昌迁到武汉。谭延闿以第二军军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长，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则由宋子文主持。我父亲在辛亥革命后谭延闿出任湘省都督时，曾与留学日本的周孤青共同筹办并主持湖南省银行，与谭等有过交往。这就为范旭东与武汉政府取得联系提供了方便。当时，长江下游仍在军阀孙传芳盘踞下，与北伐军形成对峙态势，九江上下游航运不时受到威胁，鄂、湘两省贩运食盐困难，直接影响民食，间接对靠税收维持军政开支的国民政府也增添了很大的压力。我父亲到达汉口后，通过谭延闿的介绍与宋子文见面商谈，拟在汉口设立公司，将青岛永裕青盐运销武汉，以供民食，而利税收，获得宋的同意。但他提出一个条件：要先垫缴盐税，才能

批准立案。几经交涉，最后达成协议，由信孚公司先筹缴盐税一百万元，以后在运销的青盐数额中扣除已缴税款归垫。从此，信孚公司利用青岛属于半租界化外之区的便利，不再向濒于崩溃边缘的北洋政府缴纳盐税，而在青岛将青盐交外商货轮直运武汉，或经上海租界转运武汉，避免沿途关卡检查，然后再分途运往沙市、宜昌与常德、岳阳等口岸销售。据我父亲说，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大约运销青盐近三十万担，基本上补充了因受战争影响而在市场上出现的食盐短缺，对支持北伐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出现了一次货币危机。原来当时在武汉流通的货币，除了以银元为本位外，汉口中国、交通两银行还发了钞票，通常称为"汉钞"，流通于鄂、湘、赣等省省会和通商口岸，在市场上享有较高信誉，商民都视同银元，任其流通市面。北伐军进驻武汉，国民政府迁来后，中央银行的钞票也在市面上流通。由于军事进展迅速，军费骤增，国民政府单靠税收不能平衡财政收支，不得不增发"央行"钞票，以应需要。可是市民与商店仍习惯以中、交两行汉口分行的钞票为交易手段，使"央钞"流通受到限制。主管国民政府财政的宋子文，即向汉口中、交两行施加压力，要两行借出大量钞票，作为给政府的垫款，以税收作担保陆续归还。消息传出后，市场物价便开始波动。随后，国民政府又下令将中、交汉行发行钞票的储备金（银币）交由中央银行保管。这一措施虽因中、交两行行址都设在租界内，未能立即实现，但已在市民中造成极大的恐慌。一夜之间，"申钞"（上海中国、交通两行发行）与"汉钞"（汉口中、交两行发行）的比值，激烈波动，"汉钞"贬值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一来，信孚公司只好收束业务，将部分售盐价款，转购出口产品，运沪出售，以减轻这次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

一九三〇年，为了扩大久大精盐生产，范氏在江苏省连云港开办了久大大浦分厂。该厂取当地海水制成精盐，建设颇具规模，除设有制盐工场外，还自办发电厂发电。所产的精盐，由海道运交久大各分支机构销售。主持这个分厂的是湖南的谭汉三和贵州的杨子南。谭、杨两人均系早期留学日本高工的技术人员。当时连云港尚未建成，陇海铁路也未延伸衔接，久大大浦分厂在苏北临海荒原上，犹如一颗明珠，受到人们称赞。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谭、杨两氏率领职工撤退到四川自流井设厂，继续作出了成绩。

六、创办南京永利合成氨厂

当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发展，有了盈余之后，范旭东又打算兴办其他基本化学工业。为此，他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并派侯德榜再度出国考察。这时，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东北、华北大片领土，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国民党当局不愿抗日，仍热中于反共内战，内部倾轧亦很激烈。出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自兼外交部长，而由其亲信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长。陈公博利用其权位向外国接洽借款，拟开办几个工厂，其计划之一就是办一合成氨厂。他的计划刚一出笼，即遭到宋子文的反对。随后上海金融界、实业界也纷纷发表不同意见，陈借款办厂的计划遂成画饼。

范旭东有见及此，决心在国内筹集资金办一合成氨厂。一九三三年，他经营永利碱厂获利约二百万元，资金不足，不得不借助于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上海商业银行的陈光甫，盐业银行的吴鼎昌，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四行储蓄会的钱新之，金

城银行的周作民，中国银行的张公权、李铭，交通银行的胡笔江等，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些江浙财阀与官僚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上海商业银行副总经理邹秉文赞成范氏的计划，积极为之奔走，出力最多，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解决了办厂资金问题：由永利自筹资金三百万元，再由各银行成立一个财团，承购永利发行的公司债（即不作为公司股本的一种贷款方式），筹集资金五百五十万元。发行公司债，这在国内还是一个创举，必须经政府批准，并要用永利碱厂的全部固定资产担保，按期清偿本息。由于范氏创办碱厂获得成功，且不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发生经济联系，受到民族工商业者的高度赞扬。宋子文原企图利用永利此次筹集资金的机会，打进永利内部，控制这个企业。他曾向范氏暗示，如允许他出任永利董事长，他私人所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即可承担全部投资，不必再由其他银行组织财团承购公司债了。范氏几经考虑，终于拒绝了宋子文的投资，使永利这一民族工商企业未陷入官僚资产阶级的圈套。政府当局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终于批准了永利开办合成氨厂的全部计划。

该厂厂址位于南京下游四十华里的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的卸甲甸。当时范氏选择此地作为建厂基地时，曾亲自前去考察几次，然后才圈地四万多方丈，备价收购。在未选定该处之前，他曾拟将厂址设在湖南湘潭下摄司或株洲一带，但为上海金融界投资者所反对。他们为了保障其投资不因国内政局影响而遭受损失，主张在上海租界内靠近杨树浦电力厂的地方建厂。由于上海租界地产索价太高，要付七十万元才能购得一万市平方的地皮，且无扩展余地，范氏坚决不同意，最后才选定卸甲甸这个地方。范氏当时曾感叹地说："这些财东一定要把这出戏放在他们大门口唱才放心，真是没办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